

是真名士自風流

——從何啟、胡禮垣看香港士人的儒教情結

危丁明

【摘要】雖然成長在大陸邊陲的香港，並接受西式教育，但早期香港華人精英在文化上仍然深受中國傳統影響，骨子裏一如傳統士人：以儒教道德倫理為立身處世的宗旨，以匡國濟民為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何啟、胡禮垣都畢業於香港的中央書院，何啟是負笈英倫，獲醫生和律師專業資格的跨界精英，胡禮垣畢業後遊歷海外，折衝樽俎，是實務與識見同樣出眾的人才。宗教上，兩人同受基督信仰影響，何啟更成為信徒。雖然如此，他們的中國士大夫情懷卻無改變。本文將據兩人在本地的一些活動和言論，說明儒教不但是兩人思考的出發點，其實亦是理想國之所在。在他們看來，儒教與現代化的終極價值不存在根本矛盾，反而相輔相承。於是在舉國對傳統產生懷疑，乃至思以批判打倒的情勢下，他們奮起維護。何啟支持通過《保護宋王台條例》，使失意內地官場的大儒和後來的遜清遺民們得以營建理想中的海濱鄒魯，存亡繼絕；支持創建香港大學文學院，又規定該校必須注重中國語言文學教育，從而為本地弘揚傳統經學保留一角澄空。胡禮垣則建構出別具特色的靈魂論，以融儒入佛、道，甚至調和耶教，為敬天法祖進行現代的宗教詮釋。尤有進者，他們的努力也推進了香港文化建設的基本架構，此地雖然華洋交雜，但中華傳統始終是根本，以此為前提，和而不同，彼此尊重，則是發展之所賴。

1880年1月，港督軒尼詩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1877-1883在任）委任伍廷芳（1842-1922）暫代休假的仁記洋行大班吉普（Mr. H. B. Gibb）為定例局（即後來的立法局，回歸後的立法會）議員，開啟了華人參政的先河。伍廷芳生於馬六甲，三歲隨父回國，早年在香港入讀聖保羅書院，畢業後曾在香港法院任職。1874年留學英國攻讀法律。回港後獲准在香港法庭擔任律師職務，成為第一位在英國殖民地出任律師的華人。他以自己的西式教育背景和深受香港各界華人領袖的支持而獲委任，後來雖未完成議員任期即辭職北上，卻仍被視為是香港新派華人領袖登上歷史舞台的劃時代事件。

軒尼詩港督以崇尚人道，同情華人著稱，亦對華人的經濟地位的上升態勢洞若觀火。在他上任後，一系列的政策調整，釋放了華人的經濟實力。不少的外商企業被華商併購，華商經營越來越活躍，南北行從 215 家增長到 395 家，零售商由 287 家猛增到 2,377 家，買辦則由 77 家上升到 95 家。1880 年，軒尼詩在一封函件上指出，香港最大地產主是華人，香港外國銀行發行的通貨大部分掌握在華人手上，甚至是港府的九成稅收，也均來自華商。¹ 經濟地位的變化必然引發增加社會權力分配的要求，伍廷芳出任定例局議員亦正是這種要求的反映。軒尼斯十分重視新一代華人領袖的培養，1882 年 2 月 25 日，香港《循環日報》刊出報導：

本港議例局於中歷（曆）去臘十九日敘議，港督燕制軍宣言於眾，謂：「本港有名何啟者，於前數年赴英都倫敦各書院肄業，茲聞所學，蔚然成材。每到一書院學習，必日就月將超群軼類，曾在大書院考取首名，輿論翕然，以為華人諳西學得未曾有。何君以學成，宜歸業，已附（赴）航回華，計期不日可以抵港矣。屆期本督擬偕局中諸公，先赴埔頭迎其登岸也。」觀制憲此言，其愛才之心出於至誠，不可窺見一斑哉。

¹ 〈軒尼詩致金伯利函〉，1880年7月9日，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 129/189，頁3。轉引自徐日彪：〈近代香港華商的崛起（1841-1900）〉，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1993年第3期），頁92。

在定例局討論何啟，相信與伍廷芳是何啟的姐夫有一定關係，但軒尼詩（即燕制軍）以港督之尊，率一眾定例局議員，親赴碼頭迎迓這位剛從英國學成歸國的二十多歲的華人青年，其禮賢下士之態，正反映港英政府此時求材之渴，事實上當時既為英國信任，又得在港華人支持的人材尚不太多。

一、新精英與舊傳統

除了是殖民政府的刻意提拔，新派華人領袖的出現亦是香港華商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徐日彪指出：

在經濟實力增強的同時，(18)70 年代前後華人社會出現了新舊經濟關係交替、階級關係改組的明顯跡象。首先，活躍於商品流通領域的部分富商巨賈，特別是被視為「新式」商人的洋行買辦和經營轉口貿易的行商，由於與洋行及海外市場有密切聯繫，逐漸積累了組織近代商業企業和遠洋貿易的經驗，提高了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管理的能力，其思想觀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成了名副其實的商業資本家。有些不直接從事進出口業務的舊式商人，如錢莊老闆，也因長期置身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裏，在與外國銀行發生了金融業務往來（有些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作生意）並為洋商銷售活動提供服務之後，也開始擺脫舊的經營方式，改按銀行的要求辦事，使錢莊逐漸具有了銀行的功能。60 年代後，有些富商為增殖已有的財富，開始將資本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上述各類大商人是華人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與重要組成部分。1874 年創刊的《循環日報》，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們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以該報主編王韜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鼓吹政治改良，主張發展實業，開採礦藏，興修鐵路，敷設電線，實際上是他們的代言人。1900 年以香港總商會（俗稱「西商會」）為

藍本的華商公局（香港中華總商會的前身）的成立，則是香港華人資產階級形成史上的重要里程碑。²

新型的商業資本，要求從事者必須懂得如何加強與外商的合作，而且要諳熟西方相關的法律規定、文化習慣和遊戲規則，對於只接受過土人教育的傳統華商，這無疑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而與此同時，由香港殖民政府自1860年代所制訂西式教育制度，培養出來新一代社會精英，適於此時陸續閱歷成熟，可以在不同的社會崗位發揮領導作用。如伍廷芳是律師，何啟兼為律師與醫生，均在外國學有所成，經過多年服務，深為華人社會所推重。黃勝亦曾留洋，並為香港華人報業的開拓者，是華人社會重要喉舌。經商致富的劉鑄伯、韋玉、何東、何甘棠等，與何啟合作撰寫《新政真詮》的胡禮垣，甚至參與推翻清廷革命的孫中山、楊衢雲、謝纘泰，亦均曾受益於香港的西式教育。一個更新換代的態勢經已形成，並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陸續完成交接。新派華人精英成為港英政府統治建制的一部分，華人社會的發展受到了更多的關注。

何啟（1859-1914）、胡禮垣（1847-1916）是香港中央書院（後改名皇仁書院）的舊識。何啟，字迪之，號沃生，基督教教徒。香港出生，父何福堂，是香港首位華人牧師。何啟中央書院畢業後負笈英倫，攻讀醫學、法律，獲得醫生和律師資格後回港執業，是孫中山的授業恩師；胡禮垣，字榮懋，號翼南，廣東三水人，因父胡獻祥在港經商而落籍香港。他幼年在鄉生活，自幼聰穎，過目成誦，於經史深有研習。10歲隨父來港，15歲入讀中央書院，畢業留校擔任中文教師。後輾轉投身報界，再後在南洋、日本等國遊歷。甲午中日戰爭期間曾代攝中國駐神戶領事，《馬關條約》簽訂後卸任回港。

1887年算是何啟一生中的奇蹟之年。2月，他創辦雅麗氏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在推廣西醫學，造福百姓的同時，也使自己走出了1884年以來的喪妻之痛。8月，他開辦西醫學院的設想付諸實施，並在10月宣布

² 徐日彪：〈近代香港華商的崛起（1841-1900）〉，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1993年第3期），頁94。

香港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正式成立。在此期間，他認識了自己的得意門生，日後將在中國內地叱咤風雲的孫中山。而也就在這年，他撰寫了令他聲名鵲起的《曾論書後》英文稿，並由此開展了與胡禮垣的多年合作。

當年 2 月 8 日，香港《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刊出報導，並全文轉載曾紀澤題為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此文後由顏詠經、袁竹一翻譯，題為〈中國先睡後醒論〉）的文章。曾紀澤是清中興名臣曾國藩之子，著名外交家，先後擔任駐英、法、俄等國公使，凡十八年。以其在洋務上的深資厚歷，他的文章自然引起中外各界的普遍關注。文章主要宣揚洋務派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存在問題，近代之所以飽受列強欺凌，就是因為體制不存在問題而掉以輕心，不懂富國強兵而引起的。「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緣中國之意，以為功業成就，無待圖維，故垂拱無為，默想熾昌之盛軌。因而沉酣入夢耳。」³ 既然如此，中國目前關鍵不在內務，「至於國內政事，何者或宜整飭，余暫不言。蓋國勢既強，則籌度國是，肅整紀綱，始為有益。譬如居室，先須繕完垣墉，修固門鍵，無穿窬之虞，然後可以清理內務」。⁴ 曾紀澤將強國之賭注全押在軍事，「中國現將興辦海防，創立水軍、陸軍，漸漸推廣，決勿疏懈。按目前之形勢，起造鐵路以及別項富國之法，中國亦知為必需者。然既可稍遲時日，今日姑置不為」。⁵

對於曾紀澤的文章，何啟馬上給予回應。2 月 16 日，他的 2 月 12 日讀者來郵在《德臣西報》發表。編者加上按語，稱：

〈中國先睡後醒論〉是曾紀澤侯爵撰寫的文章，幹練通達，一經面世便引起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從對這位中國前駐英公使有關觀點的自由討論而言，我們當然無需為發表以下來郵感到歉疚。來郵以「Sinensis（華士）」為筆名，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中國儒士，

³ 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見張禮恆《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頁 59。

⁴ 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頁 64。

⁵ 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頁 64。

對曾侯爵維護甚力的中華帝國之福祉，亦有着濃厚興趣。若然在此開展的討論有助於這位代表帝國光明和進步的中華之子，重新思考甚至修改他對中國發展策略的看法，那麼來郵的寫作目的無疑就完全達到。

應該說，此按語非常清晰地傳達了何啟的寫作目的：他並非純為反駁曾紀澤而撰寫文章，而是通過對曾論的評論，發表自己關於中國未來的不同看法。在文章中，何啟作為新一代華人精英的傳統情懷表露無遺，一如舊日以天下為己任的儒生。「我一直關注中國局勢，滿懷希望與焦慮，認真而熱切地期待着她能從數世紀以來的大夢中醒來。因此，我要發表的評論是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現在……確實是時候讓某個人，無論是多麼微不足道，嘗試喚醒這位幾乎是永遠的夢中人，讓她可以擺脫長期昏昏欲睡的狀態。」

何啟的文章雖以英語寫成，但其中亦夾雜了數段中文，均是先賢的警語。如文中首句中文：「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是作為自己對曾論所以快速作出反應的根據。之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分別出自《孟子》和《禮記》，則是自己文中所強調的建立「公平統治和正確政府」的理論根據。在文章的最末，何啟又以出自《論語》《孟子》的話，再次警醒曾紀澤：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何啟深知，以英語為文雖能起到與曾論針鋒相對之效，但影響範圍囿於洋人與華人精英，無助於現實的改變。當他向老朋友胡禮垣出示此文，希望胡翻譯以饗華人關注者時，得胡慨然應允。當然，胡禮垣的翻譯並不是簡單的搬字過紙，而是「取其文而紬繹之，闡發之，間亦添以己意，涉以喻言。

至外交國債等事，發揮更透，暢所欲言，援引經書，折衷尤廣。區區之心，略見於此矣。」⁶甚至還向何啟提出，把華士（Sinensis）的筆名取消，以示「言皆從實，事盡有徵」⁷，並得到何啟同意。他們的合作也為後來的研究者帶來難題，就是難以區分文中思想的歸屬。學者林啟彥、李金強提出，兩人名義出版的《新政真詮》一書九篇文章，「二人合作撰述的，似僅有首兩篇《曾論書後》及《新政論議》，其餘七篇中的五篇……幾乎都是胡禮垣作為主要作者而寫成的，何氏似乎只是一個提出意見的參與者而已」。⁸不過，對照《曾論書後》的中英文版和通觀《新政真詮》各篇，也許因師出同門，兩人無論是情懷、價值觀，又或是對中國未來的看法等都非常相似，只是何啟長於西學，勤於實務，胡禮垣則強於舊學，精於思想。兩人合作堪稱珠聯璧合，《新政真詮》中的文章雖並非全部合寫，但以他們之前對「華士」署名的考究，既然兩人同意共同署名，自然就是認同文章所反映是他們共同的觀點，強分歸屬也許並沒有必要。

5月11日，兩人合作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書後〉（又名〈曾論書後〉）在香港《華字日報》發表。針對曾氏的所謂「中國先睡後醒論」，這篇文章的論辯顯得更酣暢淋漓，文中清楚指出：

荊棘之生也，必有其本。毒泉之流也，必有其源。禍害之至也，必有其所以然之故。數十年來，中國之所以見欺於強敵，受侮於鄰邦，而低首下心，甘作孱王，而屈為軟國者，實坐內政之不修也。故治荊棘者必拔其本，若徒事於剪其枝葉，恐萌蘖之生，復盛於前也。治毒流者必塞其源，若徒事於築圍止截，恐潰決之患，不可復收也。橫逆之來，治之者宜反躬自問，消禍無形，若徒事於血氣之勇，恐乘釁尋仇，禍無了日也。今侯（指曾氏——引者注）以海防添築炮利船堅為中國之醒之據，是猶治荊棘者僅

⁶ 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頁70。

⁷ 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頁70。

⁸ 林啟彥：〈嚴復與何啟——兩位留英學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討〉，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頁1-20。

剪其葉，治毒流者僅築其防而已。以此為醒，吾寧其睡。何也？事貴有其可憑，力貴用於實際，譬如行遠者必自近始，若不自近，將神游於四極之外，惆悵徒勞，睡則無此也。譬如登高者必自卑始，若不自卑，將心放於九霄之上，焦思何益，睡則無此也。故事空有為之之名，而無為之之實，空有為之之苦，而無為之之功者，此類是也。⁹

〈曾論書後〉又力陳中國專制體制之弊，強調：科甲選士，不能造就人才；俸糧克扣，不能鼓勵武弁；炮台虛設，不能衛我岩疆；鐵艦徒矜，不能固吾海宇；訟獄不察，不能約束洋人；內政不修，不能保護藩服；虛文禮誼，不能扶救顛危；輕試其鋒，不能坐成干濟；民不信任，不能底績大功；國失權髓，不能守持自主。文中又提出自己的改良主義觀點，呼籲循序漸進的變革：

一國之所以稱盛者，非徒多戰艦炮台也。以戰艦炮台，國皆能置故也。侯欲治外，請自治內始；侯欲治內，請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請自得民之心始。民心不可見，見之於信耳。此一定不易之程途也。而行之者則曰公與平。國有公平，然後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後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後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後可以養民和；可以養民和，然後可以平外患。外患非可遽平也，仍以民和卜之耳。此循序漸進之功效也。¹⁰

1898年4月，康有為、梁啟超積極推動變法，在京師粵東會館召集保國會第一次會議，宣揚「保國、保種、保教」之道。康有為以外患日亟，亡國在即，呼籲國人必須痛定思痛，變法圖強。康有為以自己理解的孔教經義，談到：「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製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

⁹ 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頁74-75。

¹⁰ 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頁100。

致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無保養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皆與吾經義相各，故宜其弱也。」¹¹

對於名滿天下的康有為對變法的推動，何啟、胡禮垣是支持的。不過，對於康有為這番「泰西皆與吾經義合故強」的民族主義言論以及文中其他一些對事實的曲解，則認為不僅無益於變法，甚而是有害的。特別是親歷 1895 年中日甲午戰後非常時期的胡禮垣更對民族主義的盲目有切膚之痛。在何啟的慫恿下，在康氏發表演說後的兩三個月後，胡氏寫成〈康說書後〉，與何啟共同署名批駁。文章開宗明義，痛批中國士人在文化上的「驕傲滿盈」。「天下之事，莫不成於謙虛而敗於驕傲，成於戒慎而敗於滿盈。矜張之念，其幾甚微，而馴至其流，未有不足以誤國害民而亡天下。故善治病者；去其根，善治禍者除其本。苟不於其本而治之，則愈治愈紛，愈紛愈亂，變態百出，為害將至於不可勝言。」¹²「故為中國計者，必先去其驕傲滿盈，乃可行其謙虛戒慎，以變中國之法，而起中國之衰；蘇中國之民，而扶中國之運。若猶教以矜才使氣，則是火既烈矣，而復加之以薪，瀾既狂矣，而復除之以障，焉有不憤然盡喪者哉。」¹³在胡禮垣和何啟看來，康有為「泰西皆與吾經義合故強」的言論，正是這種「驕傲滿盈」的病根。「是說也，其言大，其聲洪，聽者不察，必為所惑。不知保民、養民、教民，何須經義。外洋諸國惟不用經義，故能為所當為，亦猶堯舜三代時無經義，故能日新其德。今欲取二千餘年以前一國自為之事，施諸二千餘年以後五洲交涉之時，吾知其必扞格而不相合矣。中國之不能變，蓋經義累之也。」¹⁴「嘗深求中國所以窮而不變之故，其禍本於驕傲滿盈；又嘗深求其所以致此驕傲滿盈之故，其病根於八股經義。」¹⁵

¹¹ 康有為：〈京師保國會第一次集會演說〉，見姜義華等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頁 57。

¹² 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頁 247-248。

¹³ 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頁 248-249。

¹⁴ 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頁 267-268。

¹⁵ 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頁 267-269。

對於道統繼承，兩人提出應重心傳，而不必拘泥於經典字句的觀點：

夫利世者，聖人之心源。經書者，聖人之陳迹。心源歷世而無異，陳迹閱時而不同。以心觀聖人原無可議，以迹觀聖人必有可疑。由其迹而推其心，不若法其心而略其迹也。曩者《新政論議》之作，謂宜法古帝王執中精一之心傳，而行古帝王因時制宜之運量者，蓋以吾人之心印聖人之心，非以聖人之迹印吾人之迹也。¹⁶

何啟、胡禮垣後來把〈曾論書後〉、〈康說書後〉，連同〈《勸學篇》書後〉、〈新政論議〉、〈新政始基〉、〈新政安行〉、〈新政變通〉等政論著作，按區鳳墀（1847-1914）的提議，以《新政真詮》為書名，於1900年底在香港出版。翌年上海重印，《大公報》創辦人、著名記者英斂之（1867-1926）為序，讚嘆此書：「議論宏深，識見遠到……晰疑辨難，推勘入微。務期真理昭揭，不使偽辨混蒙。挈領提綱，搜精抉髓。辨別今昔、中西之異同，發明郅治、大同之歸宿。大聲疾呼，振聾發聵。苦心一點，熱淚兩行，直使華（英自稱一引者注）五體投地。一瓣心香，因倩《格致新報》館重印，公諸世人，以開吾中國四千年之風氣，以牖吾中國四萬萬民之聰明。」¹⁷

不過，因大勢已去，積重難返，清廷對於諸如《新政真詮》這類改良主義思想已難以切實推行。在清廷久延殘喘之時，香港以及海外之華人的耐心也逐漸消失，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越來越得到支持。甚至何啟也參與到其中，在1900年為遊說英方支持推動李鴻章宣佈兩廣獨立而奔走，胡禮垣則在1903年謝纘泰發動洪全福廣州之役密謀失敗後，與何東一起被清廷列為嫌疑犯。

顯然，相對於來自內地，深受傳統教育影響，依然滿腦子皇上聖明，強調莫談國事，視香港為暫借之發財地，以故鄉為落葉之歸根的一眾舊派精英，兩人表現出的是一派縱橫捭闔，匡時救國捨我其誰的新風。然而，新舊

¹⁶ 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頁267。

¹⁷ 英斂之：〈《新政真詮》序〉，見《胡翼南先生全集·新政真詮》，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編》第二十七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頁49-50。

派華人精英的交接與其說是革命，倒不如說是繼承。這除了新派華人精英當中不少人其實正是舊派精英的子弟，更在於這群深受西學薰陶的人大都有相當的舊學根柢，深諳華人的文化傳統。他們可以很好理解港英政府的政策，但也很能根據華人社會的實際情況給予意見的反饋和爭取適當的調整。這在被認為是新、舊派精英權力交接分水嶺的 1894 年鼠疫事件中亦可見之。鼠疫發生不久，瞬即廣泛傳播，死亡人數不斷上升。港府派遣英兵，針對華人社區逐戶搜索和消毒，強行拖出患者和死者，以遏止疫情。事件觸發華人極度不滿。東華醫院代表華人社會向港府陳情，要求停止行動。港府不但不允，並以東華醫院堅持的中醫服務無助疫病治療建議關閉。時任港督的羅便臣指示成立委員會進行調查。包括何啟等人在內的委員會經調查後，認為關閉東華醫院並不可行，但引進西醫治療卻屬必須。時以舊派精英為主的東華醫院決策層亦認識到，在關閉和引進西醫治療兩個選項中，引進西醫仍是上算，若關閉東華醫院或由洋人掌理院務，都等同作為華人代表機構之東華的解散。事件最後以 1897 年東華醫院引入西醫服務告終。事件的處理中，既符合港府堅持的西醫治療原則，又照顧了東華醫院的存在和發展，何啟等人不論在專業意見抑或華人社會的實際情況介紹方面，顯然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新派華人精英亦因此更得港府的信任和華人社會的支持，形成了一個三贏的局面。

胡禮垣是新派精英中舊學出彩者，這源於他自小與母在家鄉廣東三水生活，系統接受過傳統教育有關。舊學的經驗，在香港接受的西學衝擊，在徘徊、比較與選擇中，胡禮垣學養迅速地成長。從中央書院畢業，經過香港、內地和海外的一番經歷後，更加成熟燦爛。1895 年，歲過半百的胡禮垣回到香港，開展進入生命中最精彩的一段，「日惟閉戶著書，考察列國政治得失，與何君啟研究法律。至於哲學、宗教，莫不窮其要理。晚年復研求佛學，具有心得」。¹⁸ 他與何啟合著的《新政真詮》被譽為改良主義的經典，另外自己的詩文集《梨園娛老集》、《伊藤嘆》、《滿州嘆》等，均膾炙人口。

¹⁸ 陸廷昌：〈胡翼南先生事略〉，載《胡翼南先生全集·新政真詮》，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編》第二十七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版），頁 55。

他貫通西學卻始終不卑孔教，遍歷外洋卻常常心懷祖國。他為批判歷代統治者為達專制目的而曲解孔教，曾賦詩一首，並自注以明之：

精一執中堯舜禹，自由平等美歐東。帝皇法物果何在，橫豎參觀得所宗。

神化丹青思有竅，聖人糟粕學無功。等閒尋出真贓據，論在五年七月中。

雍正五年七月諭禮部云：「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按此諭是直以孔子為組織專制之人，奉君王以最大之倫紀至尊之名分也。然則其所以崇孔子者，蓋為此耳。此何物也，私也，贓也。夫中國自秦至今，其通行國中為國民之所共守而不敢或違者，皆荀、李之教，非孔、孟之教也。孟子私淑於孔子，李斯則師事荀卿。孔、孟、荀、李同名為儒，名同而實則大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蓋本孔子之言，性相近也。李斯立嚴刑，設峻法，蓋本荀卿之言，人性皆惡，其善者偽也……若取而行世，則孔孟之道足以仁壽斯民，振興世界。至於干祿榮身，求一時之倖進，則荀李之道獨得矣，何則？人主履至尊之位，常以壓服萬民為心，峻法嚴刑獻諸人主，是猶以水濟水，無不和合也……雍正時之於孔教，名為特重，實則無異秦政之時行李斯之道耳，安望其能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哉？¹⁹

¹⁹ 胡禮垣：〈滿州歎·其七十四〉，見《胡翼南先生全集·詩集輯覽卷三十七》，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編》第二十七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頁1908-1911。

孔子之教，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足以「仁壽斯民，振興世界」，只是帝皇為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實際上用的是嚴刑峻法，從未實行過真正的孔教。而另一首詩中，胡氏則表明自己心目中的聖人之道：

當年孔子本無奇，情理拈來作主持。不仕恐流專制血，講書能入後生脾。

楹間夢奠檀弓陋，道統相承邱浚欺。我學仲尼惟一貫，下因水土上天時。²⁰

詩末又有自注云：「大同之道，不外乎忠恕。予初著書，名曰：《天人一貫》，本孔子忠恕之道以立言也。因係少作，棄而不錄……蓋去初為書時已四十年矣。」²¹ 在胡氏看來，忠恕之道正是孔教之根本，必須以人性本善為根本認知，推己及人，又不能泥古不化，必須緣水土、因天時，根據客觀現實而改進變化。

他的老朋友何啟，雖然舊學水平遠不如他，不過卻一直為傳統文化在香港的繼續存在和弘揚盡力，貢獻良多。宋王台本是九龍馬頭角海濱一名為「聖山」山頂的景點，由三塊巨石組成，相傳是宋帝趙昀曾流亡之所。1898年英國強租新界，新九龍開闢，築路建房需用石料，一些商人遂在聖山開炮採石，受到當地居民反對。何啟為此奔走呼籲，直接促使港府於1899年頒佈《保存宋王台條例》，為香港保留此饒有深意的歷史見證。何啟是推動成立香港大學的社會賢達之一。自港督盧押（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1907-1912 在任）1907年倡議在香港建立一間綜合性大學之後，何啟提出未來的香港大學的三院制設想，即除合併已有的香港西醫書院和香港工學院外，還要開辦文學院。

香港英國殖民政府於1911年在薄扶林道興建香港大學，分設文、醫、工等學院。在文學院學習的中國籍學生必須修習中國古典文學。其初擬在皇仁中學堂漢文教習中遴選二人升任大學教習，惟

²⁰ 胡禮垣：〈滿州歎·其七十四〉，頁1912。

²¹ 胡禮垣：〈滿州歎·其七十四〉，頁1912。

因皇仁的漢文教習最高學歷只是前清秀才，不符合大學教習資格，後乃採納定例局議員何啟大律師的意見，香港大學的漢文教習必須聘請前清翰林充任……紳商介紹賴際熙（字煥文，號荔垞，廣東增城人，清光緒癸卯年進士，翰林院編修）任香港大學漢文總教習（當時尚未有教授、副教授、講師等名稱），講授史學，由區大典（字徽五，南海人，清光緒癸卯年進士，翰林院編修）教經學。²²

何啟的努力竟使香港大學成為舊學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堡壘。經歷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後，內地幾乎所有學府，都把舊學請了下來。白話文鋪天蓋地，而且成就非凡，亦很快在全社會得到普及。惟獨香港大學，依然子曰詩云，弦歌不輟，甚至影響到了中小學的中文教育乃至於報刊行文。直到1935年，著名作家、學者許地山南來就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全力推介新文化，情況方告改觀。

二、大同世界的憧憬

新派香港華人精英對傳統文化的不離不棄，除了其有助於了解華人社會和有利於新舊權力交接，其實也是他們乃至整個海外華人社會一種更為遠大的憧憬的反映。事實上，當時輪轉到近代，老大中國四面楚歌，亡國滅種迫近眉睫。身在海外或香港的華人，雖然均在西方人的統治之下，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還是懂得的。新派香港華人精英，與舊派一個主要不同，是對清末以來中國政治、特別是外交方面的積極介入。如首任華人定例局議員的伍廷芳，便是為出任清末重臣李鴻章幕僚，協助中國與列強進行外交談判而離職。他日後成為中國的著名外交家、政治家。其子伍朝樞，1927年就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韋玉曾協助清廷引渡潛逃罪犯。何啟為推動李鴻章宣告兩廣獨立而向英方遊說等等。周壽臣則曾先後協助穆麟德、袁世凱處理朝鮮問題。這一方面是華人精英們熟悉洋務特

²² 伯子：〈辛亥革命前後清遺老在香港的活動〉，見《文史資料選輯》總 144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 年版），頁 217-218。

長的發揮，另一方面則應該說是來源於他們心中的理想。新派香港華人精英大都有海外經歷，或是出生在外國，或是曾遊學在外，廣闊的世界使他們深切地認識到，中國並非世界的中心，也無法自外於世界。而在殖民地的生活經歷，也使他們相信西方文明所標榜的理性和公平。因此他們嚮往的是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香港佛教聞人黎乙真說胡禮垣，「生平以大同為主義，數十年來立說著書未嘗或變其宗旨。蓋所言皆平理、近情、順道、公量，絕無流弊」。²³ 胡禮垣心中的大同社會：

……大同之理，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其視地球各國，決無大小強弱之分，而生其攀援傲慢之見也。慕聖賢己飢己溺之懷，則仁同覆載，學善士大慈大悲之念，則愛及愚蒙。²⁴

農業國與工業國為物質上之協力，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為精神上之協力。一方為發展自國之特長，一方確收國際上之道義。²⁵

香港近水樓台，華人精英們較容易去內地實踐自己的大同夢。在海外，華人卻必須更實際地思考。誠如新加坡土生華人、著名孔教信徒林文慶所說：

作為一個獨特的民族，我們也能牢牢地守住自己以往光輝燦爛的歷史，勇敢地奮鬥，以便能在商業、科學和藝術的最前沿中取得最後的勝利。否則，兩種悲劇之一將降臨海峽華人的身上，要麼他們將變質而被完全巫化或歐化，同時將永遠地割斷與自己民族的血脈淵源。這是一個不堪設想的過程，因為這一過程近百年來一直就在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持續進行着。海峽華人的另一悲劇是他們將走向墮落，死抱着那些甚至在中國都已被革新的了華

²³ 黎乙真：〈輯印金剛般若馱世經序〉，見《胡翼南先生全集·金剛馱世卷五十七》，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編》第二十七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版），頁 2743。

²⁴ 胡禮垣：〈宗教略義下〉，見《胡翼南先生全集·文集彙鈔卷五十七》，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編》第二十七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版），頁 2726-2727。

²⁵ 胡禮垣：〈宗教略義下〉，頁 2739。

人習俗和舊觀念不放。不難預見，在這樣的環境下，目前海峽華人所擁有的一切優點和影響力將會喪失殆盡。²⁶

海外華人熱衷於建立跨地域的華人經濟圈，共同的華人文化背景是重要的基礎。華人必須懂得守住自己既有的輝煌，攜手並進，否則不但無法在商業等各方面參與同其他民族的競爭，甚至會在同化的過程中迷失。同樣地，對新派香港華人精英來說，即使大同世界有實現的可能，中國仍必須是中國，否則大同亦會變得毫無意義。以當時的認識而言，能為華人或中國這個民族身分提供保證的，依然只是曾長期在意識型態領域獨尊的、以孔教為代表的傳統文化。

不過，對有些華人精英而言，尊孔不盡是孔教。1901年，香港報紙報導，新加坡華商曾兆南請從德國經新加坡回國的醇親王載灃代奏朝廷推行孔教：

自弱冠經商南洋，見西人崇奉基督教專心致志，各國皆然。獨我中國人奉孔教有名無實，問以孔教如何，茫然不知也。是以奉孔教之人，忽而頂禮，忽而齋醮，忽而迎神賽會，忽而簽杯扶乩，種種誕妄不經，誠為風俗牢不可破，而猶詡詡曰：孔教中人也。噫嘻，此豈孔教之宗旨哉。竊謂孔子之教，不外倫常，不致知以明倫常之理，不力行以盡倫常之道，非孔教也。²⁷

奏摺中曾兆南提到的南洋所見，說明了當時的海外華人信仰中，孔教正在興起的實際情況。這當然是得益於維新派的極力提倡，但從信仰者均各自從本身熟悉的方式用以供奉和崇拜的情況看，實際上更多是出於自己對孔教的追求和理解。從宗教的角度看，荒誕不經的崇拜方式對其為宗教絕無影響。曾兆南更多的是着眼於儒家道德倫常的教育之教，即精英對大眾社會的領導，故非之。

²⁶ 轉引自嚴春寶：《大學校長林文慶》，（福建：廈門大學博士後論文，2009年），頁55。

²⁷ 〈請傳孔教〉，載《香港華字日報》1901年11月30日。

諳熟儒教經義，通達佛道兩教教理，與倡行三教合一的先天道宗教領袖田邵邨結為知交，而又對基督教教義頗為佩服的胡禮垣，他對宗教則有更為精緻的見解：

夫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不可知，然而性也、道也、教也，則同條共貫不能離。而二之者也，道不本於性，非道也；教不本於道，非教也。教本於道，道本於性，則不可知之天命亦無不可知矣。²⁸

胡氏強調道德本於人性，但宗教必須包含道德，而且只有通過實踐宗教所教導的合符人性的道德，人天一貫，才能得知神秘的天命。他一方面強調道德必須符合現實人生的需要，於此同時，又對人的道德實踐予以神聖化，開啟了後來者創立香港孔教之大道。

在好友區鳳墀、何啟相繼謝世，而全球正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夢魘的1914年，胡禮垣在極度鬱悶之中，為了打造理想的大同社會，寫下宗教哲學著作《靈魂不死》，力圖為人類的共存貢獻自己最後的宗教方案。一如同時代的許多士人，在胡氏看來，人類之所以不能臻於大同，障礙主要在於無窮的物欲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他圍繞靈魂不死的命題，分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進行探討，認為人類所有的哲學和宗教的分歧，其實均出於對靈魂性質的誤解。他說：

自耶穌氏出，而聖神為靈魂，魔鬼為體質，其說遂立於歐洲；自柏拉圖出，而唯心為靈魂，唯物為體質，其說遂開希獵；自喬答摩出，而淨者為靈魂，染者為體質，其說遂倡於印度；自漢宋諸儒出，而天理為靈魂，人欲為體質，其說遂行於中國。²⁹

²⁸ 胡禮垣：〈宗教略義下〉，見《胡翼南先生全集·文集彙鈔卷五十六》，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編》第二十七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頁2740-2741。

²⁹ 胡禮垣：〈靈魂不死〉，見《胡翼南先生全集·文集彙鈔卷四十七》，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編》第二十六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頁2359。

實際上，靈魂遠比諸賢的二分法設想含義更加豐富，足以「總括二儀，遠包三界，彌繪八極，洞貫十虛」³⁰，確立靈魂不死，亦即靈魂永恆，殊為重要。而在他眼中，所謂靈魂，有大小之分，即大靈魂和靈魂或小靈魂，「人與物則靈魂而兼肉身也。肉身為累，則雖天縱之聖，亦必不能如超然脫殼之靈魂」。³¹ 這顯然就是史上聖賢均無法窺見靈魂真義的理由；而「上帝為大靈魂」³²，並進一步指出：

世界者，其精銳乃一大靈魂耳。此一大靈魂也，其名曰以太（Ether）。以太者，電浪也。其為物也，乃傳空氣至神至妙之用者也，無竅不入，息息相吹。而地球中大小知覺運動之物，莫不取諸大靈魂。³³

在胡氏看來，上帝其實就是世界，精神也就是物質，顯然這是他對基督教義所稱神創造世界的一個獨樹一幟的解讀。當然，雖以上帝為大靈魂，但作為多元宗教論的儒者，胡禮垣對「上帝」的理解，與其說是基督宗教所定義的造物者，倒不如說更似是道家所說的重玄，或佛家所說的空，是所謂的非二元性概念：

天理良心即世界之神也，如浩然之氣充塞宇宙，入乎萬物之中。神在物物，而物物有神，神不離乎物也；物物有神，而神在物物，物不能離於神也……夫造物者有耶？無耶？無也，則胡能造物，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明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者，物各反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³⁴

³⁰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359。

³¹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378-2379。

³²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379。

³³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381-2382。

³⁴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377。

明乎此，胡氏認為人的生命就有了新的意義。人不能再只圖滿足於自己的物欲而無惡不作，因為他源於大靈魂，負有為祂使世界更完美的義務。而且，既然精神即物質，他一直強調的傳統道德，就成為亙古不變的客觀標準。人「所以明善惡，別是非，邁前賢，開後學，通古今，貫天人者，皆靈魂之為之也……物質有相引之勢，相引者，相類以從。人之類，無不同，則人之靈魂亦無不同也。故人雖死，而其生平所作之事長在人間，與林林總總之徒，繼繼繩繩而終古。而流風雖遠，陳迹如新者，則瓠史稗官之記載是也」。³⁵ 他指出，「生時之縱慾有限，死後之追悔無涯，然則欲蓋前愆，回頭是岸者，亦惟於靈魂不死之據加之意焉。」³⁶

而且，由於大靈魂「其為物也，包羅宇宙，散而為不可說。不可說之無數小靈魂焉，其質也，微之又微，微至於無。寓空氣中，動而為息。息之吹人之生也，得之以為呼吸之氣。及人之死也，呼吸之氣復出而為息，息之吹返空氣中與大靈魂合。尋機而散，以為人之再生焉」。³⁷ 由此觀之，所謂生死雖不過動靜之間，但只有合乎傳統道德地為社會作出貢獻才可真正無悔一生，「然而懿行芳踪遺其徽，而自有千古，存神過化通其意，而不負一生。死死生生，隨處修行，其以此哉」。³⁸ 「吾人既入此世間，則不能遽作出此世間之想。惟有忘其為惡濁，忘其為浩劫，忘其為囂塵，而怍怍然，惻惻然，懇懇然，懃懃然，思以和眾安民者，為當世之補，且以開來繼往者為後世之師。苟其情深而文明，必有不能自己者也，是以學究幽明者，常於肉身靈魂分辨先後，調劑其宜。其為肉身謀者不過二三，而為靈魂計常居七八。實德既重，虛榮自輕。察其所安，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尚不為也，況為陰謀秘計之不可告人者哉。」³⁹

正因為如此，在胡氏看來，靈魂不死並非只是一個宗教或哲學命題，它更是正人心、厚風俗，匡時救世，乃至走向理想國度，最終獲得永恆的起

³⁵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396-2397。

³⁶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398。

³⁷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398—2399。

³⁸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401。

³⁹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403-2404。

點，從而為儒教的修齊治平，為士人任重道遠，最終建立大同世界的憧憬，找到了神學的背書：

人心之正，正以此矣；風俗之厚，厚以此矣；進化之增，增以此矣；文明之長，長以此矣；窮奇之驅，驅以此矣；禱祝之絕，絕以此矣。而且地維之立，以此而立；天柱之尊，以此而尊；人格之高，以此而高；天國之近，以此而近；太平之致，以此而致；郵治之臻，以此而臻。⁴⁰

三、小結

為中國現代化尋找出路，是何啟、胡禮垣等一代香港華人精英苦思冥想的問題。對於國家當時所面臨的危機，飽受西學浸淫，又曾周遊列國的他們，自然洞若觀火。他們深知老大中國今天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也懂得古老的中華文化當時在許多方面已遠較西方文明落後。然而，即便如此，他們依然深受中華文明的薰陶，靈根深種，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傳統儒士態度和方式去處理問題。他們反對洋務派的師夷長制夷的改良主義觀點，全心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卻又對君上忠貞不二；批判維新派的「泰西皆與吾經義合故強」的民族主義論調，認為這是國人驕傲自滿，故步自封的病根，卻又致力經營海濱鄒魯，在香港保留儒家的千年道統。兩人雖未有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洪流中翻雲覆雨，他們對香港卻遺澤深厚，甚至可以說是走出革命以外的一條發展之路。只是兩人一生都可能在王國維《三十自序》所說的「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中撕裂，何啟猝逝，沒能看到他的反省，而胡禮垣的靈魂不死論也許正是他們這一代徘徊於新舊之間的士人最終的安魂曲。

⁴⁰ 胡禮垣：〈靈魂不死〉，頁 2404-2405。

[Abstract] Although they grew up in Hong Kong, which is on the border of mainland China and received a Western-style education, the early Chinese elites in Hong Kong were still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Internally, they were like the traditional scholars: they took Confucian morality and ethics as their tenet in life, and felt they had an inescapable responsibility to help the country and benefit the people. Ho Kai and Hu Liyuan both graduated from The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 in Hong Kong. Ho Kai studied in Britain and gained du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s a medical doctor and a lawyer, whereas Hu went traveling after graduation. Hu had good diplomatic skills and was accomplished with outstanding practicality and insight. Religiously, both were influenced by Christianity, and Ho Kai even became a Christian faithful. Even so, their Chinese scholarly sentiments had never been changed. This article, based on some of their local activities and remarks, will explain that Confucianism is not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ir thinking, but also embodied the *Politeia* (ideal country). In their view,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ultimate value of modernization. Instead,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refore, when the whole country had doubts about the tradition, and even wanted to overthrow it with criticism, they rose to defend it. Ho Kai supported the passage of the “Song Wong Toi Reservation Ordinance 1899,” so that the great Confucian scholars who were frustrated with the mainland officialdom and the later survivors of the Qing Dynasty could build an ideal cultural gathering place near the coast to sustain the cultural legacies. He also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culty of Art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stipulated that the university must focus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helping to preserve a heaven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lassics. Hu Liyuan, on the other hand, constructed a unique theory of the soul, integrating Confucianism into Buddhism, Taoism, and even reconciling the teachings of Christianity, thus providing a modern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to the worship of heaven and the ancestors. They also promote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Hong Kong's cultural construction. Although this city is mixed with Chinese and

foreigners, Chinese tradition is always the foundation. Under this premise, people can live in harmony despite diversity, and mutual respect is the foundation of development.